

# 谢觉哉救灾思想述略

郑志锋

(福建中医药大学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福建 福州 350108)

**摘要:** 谢觉哉是一名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在处理灾荒方面有诸多论述,形成了其深刻的救灾思想。谢觉哉十分关注自然因素之外的灾荒成因,在区别解放区政府救灾与国民政府救灾的本质不同的基础上,提出新社会救灾的主体是人民,救灾是与灾荒的长期斗争,救灾是一个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在救灾工作中应把救济款的发放作为一个重大问题来抓。从谢觉哉的救灾思想中,我们既可感受到新旧社会处理灾荒问题的本质区别,还能发现其不可忽略的当代价值。

**关键词:** 谢觉哉;灾荒问题;救灾思想

**中图分类号:** D632.5;K25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117X(2011)06-0060-05

## Brief Account of Xie Jue'ai's Disaster - Relieving Thought

ZHENG Zhifeng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Fujian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uzhou, Fujian 350108)

**Abstract:** Xie Jue'ai was a highly respected social activist and he had many writings on how to deal with disasters, which formed his profound disaster - relieving thought. Xie Jue'ai concerned very much about the famine causes except natural factors, and he was clear that the disaster relief in the liberated areas and that in the national governmental areas are essentially different. Based on this, he pointed out that the people is the main body of disaster relief which is a long struggle and should be combined with the production process, and the release of relief funds should be taken as a key issue in the relief work. From Xie Jue'ai's disaster - relieving thought, we can not only feel the essen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new and old society in coping with disasters, but also can discover its contemporary value which cannot be neglected.

**Key words:** Xie Jue'ai; famine; disaster - relieving thought

谢觉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德高望重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他关注民生,体恤民情,特别是担任新中国第一任内务部长期间,在处理灾荒方面发表诸多论述,形成了其深刻的救灾思想,对当代救灾问题处理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 一 关注自然因素之外的灾荒成因

灾荒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经历

了旧新社会转变的谢觉哉对灾荒的成因有自己的独特看法。早在民国18年(1929年),谢觉哉就在《红旗》上发表了《谈谈现在的灾荒》一文,提出了灾荒成因的看法:1. 灾荒并非天降。“风调雨顺虽然难得,然断没有这样的不风调雨顺的时期。”<sup>2</sup> 并非人民不知道防灾。“中国人民虽然不知道科学,然水利农时,驱蝗积谷的老经验却很富有。”<sup>3</sup> 国民党军阀是大饥荒的制造者。“壮丁呢,死亡了;室庐呢,烧毁了;财物呢,刮尽了;实业呢,破坏了。既没

收稿日期: 2011-09-27

作者简介: 郑志锋(1975-),男,福建永春人,福建中医药大学讲师,博士,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有储蓄,而又无人力耕种,无资本耕种,这样,安得不灾荒?”<sup>[1]204</sup>。1950年4月25日,谢觉哉在中国人民救济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旧时代压在人民头上的统治阶级,削弱了人民的抗灾力量,甚至他们直接造灾,然后在自己涨满了的荷包里,拿出些微,假装慈善。”<sup>[1]719</sup>的确,日本帝国主义的8年侵略战争、蒋介石的4年反人民内战,强改河道,炸毁堤防,焚杀搜刮,无所不至,大大减弱了人民抗灾的力量,更是加重了灾荒。所以,在报告的最后,谢觉哉宣告:“让中国灾荒的制造者——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反动派去幸灾乐祸罢!”<sup>[1]724</sup>

据研究,“我国天灾多源于人祸、频繁战争和腐败的政治,致使能够实行的防灾责任,如清淤河道、加固堤坝、植树造林等也渐渐减少了,结果导致灾荒频繁发生。”<sup>[2]</sup>据史料记载,民国元年至26年(1912-1936年),各种较大的灾害就有77次,其中水灾24次、旱灾14次、地震10次、蝗灾9次、风灾6次、疫灾6次、雹灾4次、歉饥2次、霜雪之灾2次。<sup>[3]40</sup>对于造成这些灾荒的社会因素,当时的报刊多有报道分析。如1932年8月19日《上海新夜报》载:“此次山西大水,酿成巨灾,可谓半由于天,半由于人。而为政之疏略,实亦难辞其咎。言汾堤之决口,实因堤坝失修之故。”<sup>[3]96</sup>又如《日文东亚杂志》1933年6月号载:“一九三一年之水灾,……淹没人家一千四百万户,损害金额达四万万五千万以上。……然此次水灾本可防止,可防而不能防,此实吾人所应注意者。盖扬子江堤防修理费,年拨海关附加二百万元;特别附加七百万;粮税附加一二百万元;……;合计有一五二〇万元。此巨额资金,一部分入军阀之私囊,一部分则尽入川江龙公司(鸦片公司),而此公司后来又告破产。”<sup>[3]97</sup>再如1934年5月12日《上海大晚报》载:“运河沿岸各县治运亩捐,大多为各县当局所挪用。即有少数解省之款,又被省府当局挪充急需,以致治河工款,反告向隅。”<sup>[3]98</sup>由这些分析可见,谢觉哉没有把灾荒仅仅归结为自然因素,而是从当时的社会背景中寻找关键成因,是有其深刻道理的。

## 二 区分解放区政府救灾与国民政府救灾本质

谢觉哉对国民政府和解放区政府救灾本质的区别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他不认同旧社会反动

统治阶级的赈济,认为:“如果不是生长统治阶级,而的确来自田间的人,一定想到灾民是不希望赈济的,从来也没有赈济过。中国式的赈济,纸面上写着‘嘉惠灾黎’,‘活人无算’,实际上是赈款上了腰包。”“中国人的一切痛苦都是帝国主义给与的;灾荒,是国民党军阀造成的;国民党军阀,是帝国主义造成的。从强盗荷包里拿出点赃物,向被盗抢的主人大讲其仁慈,大家也就说这强盗爷真是‘替天行道’,这是多么便宜的事。”<sup>[1]205</sup>在旧社会,统治阶级把救济工作等同于“慈善事业”,主观上希望救济对象对他们有所依赖,而且所给予的一点点赈济经过层层刮扣,到灾民身上已所剩无几。这种赈济并非真正的赈济。谢觉哉敏锐地洞悉了这一点,他在1951年4月召开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救济机关会议暨全国城市救济工作会议开幕词中,就深刻揭露了旧社会所谓救济事业的本质:“他们是社会一切灾难的制造者,又装作是一切灾难的救济者。强盗打进家里,什么都抢去,临时丢给你几件烂衣、几升糠米,叫做‘施舍’,要你感谢。这就是以前所谓救济事业的本质。”<sup>[1]767</sup>因此,谢觉哉认为真正的赈济,“只有同阶级的人握到了政权和经济权才行”。<sup>[1]206</sup>

而对于解放区的救灾,谢觉哉认为与国民政府的救灾有着本质的区别:由于解放区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政府的钱粮就是人民的钱粮,因此政府的救济就谈不上恩赐;解放区的人民之间是互相帮助的关系,一时接受帮助,为的是将来不要帮助,因此接受帮助并不等同于依赖。“事实证明:凡能够克服恩赐与依赖两观点的,在他面前就没有不可战胜的困难。反之,工作效果就要差些。”<sup>[1]719</sup>在谢觉哉看来,解放区的救灾克服了依赖与恩赐的思想,是人民以自己的力量对抗自然以及人为的灾祸(指的是已被推翻的统治阶级遗留的创伤和某些在今天难以消灭的灾祸),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救灾。

谢觉哉认为,两种不同的救灾理念势必会带来不同的救灾效果,而事实也证明了他的这一看法。仅以民国31年(1942年)横扫黄河中下游两岸的大灾荒为例。在河南省国统区的72个县中有1600多万人食不自给,约占全省人口的1/3,其中数百万人颗粒无收,即使根据《国民政府年鉴》保守的估计,受灾人数也在146万,其中非赈不可的约200万

人。<sup>[4]163</sup>国民党中央虽然在是年十月曾派大员前往河南查勘灾情,但此后迟迟不见救灾的行动,就连有关灾荒的消息也被封锁,而许多商人和贪官却囤积大米,大发其财。到了第二年,迫于强大的舆论压力,国民党才不得不拨发赈款救济,但此时对于灾民已无太大的意义。据不完全统计,两年中河南省约有200~300万灾民被夺去了生命。<sup>[4]167</sup>因此,“这样的赈济不仅没有化作中原人民的‘福音’,却演变成了抗日战争后期中国最大的政治丑闻之一。”<sup>[4]170</sup>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受灾最严重的是位于太行山脉两侧的晋冀鲁豫边区,需要救济的灾民有150~160万人。由于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主政府能够紧急动员、及时救灾,并倡导广泛开展以节约、互助为核心的社会互济运动,还把救灾与生产结合起来,推动了一场规模浩大的群众性生产度荒运动,边区的救灾度荒取得了很大的成效。边区、敌占区和国统区相比,因灾荒的程度要轻得多,一度出现了敌占区和国统区灾民大批奔向边区的景象。“以晋冀鲁豫边区为代表的这种大规模有组织的救灾度荒运动,是在抗日民主政府领导下的、以根据地党政军民全体力量为基础的真正群众性的社会自救运动。”“整个边区的党政军民在严峻的灾荒面前团结起来,凝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汇成了一股巨大的力量。正是这种力量成为边区战胜天灾敌祸的最基本条件。”<sup>[4]187</sup>

### 三 提出新社会救灾的新理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人民翻身做了主人,必然会以一种崭新的状态去面对灾害,去解决救灾问题。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内务部长的谢觉哉对新中国的救灾充满了信心,提出了有别于旧社会的新救灾理念。

#### (一)救灾的主体是人民

1950年7月20日,谢觉哉在第一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上的补充报告中,针对一年来生产救灾工作,结合中央精神,提出了9点认识,其中之一就是要把救灾工作看作全体人民的工作。“这是大事情,不是政府少数干部能做好的。必须通过代表会议或代表大会,把救灾工作变成老百姓自己的事情。因为一经过会议,大家就会想出好的办法,同心合力去做了。”<sup>[1]735</sup>1954年12月,谢觉哉在《五年

来战胜灾荒的略述》的讲话中,总结了完成救灾任务的四条经验,其中一条就是“救灾工作,必须依靠群众,有领导地依靠群众。灾区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应以讨论生产救灾工作为中心,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使救灾的政策和各项工作为人民直接掌握,这样,政府工作和人民的实际才不脱节,才能发挥无限力量。”<sup>[1]893</sup>

谢觉哉认为,救灾的方针、办法要为人民所掌握,救灾的力量才会大。为此,他提出可以通过两种让人民掌握救灾政策,并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的方式。一种方式是让各级干部深入灾区亲自领导,通过和人民一起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帮助生产、共同生活,逐渐使救灾的方针政策为人民所掌握。1949年,华东、华北等地发生了严重的水灾,中央人民政府曾派出5个观察组,由人民监察委员会刘景范副主任、内务部武新宇副部长、陈其瑗副部长等领导,分别到平原、河北、山东、苏北、皖北灾区指导救灾。河北杨秀峰主席亲自走了16个县47个村,河北全省干部下乡救灾的达4000多人。另一种方式是通过灾区的各界代表会议和人民代表大会,由灾民代表们自己讨论,通过他们去组织人民。如平原省金乡县原仅发动34%的群众参加生产,在各界代表会召开后,发动的男劳动力增至71%,女劳动力增至62%;再如河北武清县开过各界代表会后,纠正了干部好高骛远的空计划,接受了从小处着眼的工作精神。

#### (二)救灾是与灾荒的长期斗争

在谢觉哉看来,救灾不仅仅是“赈救”,它更是对灾荒的斗争。如民国31~32年(1942~1943年),华北敌后区成千上万的人民和蝗虫作战,把蔽天的蝗虫消灭在土坑里、扫帚下;再如水灾发生,党政军民上堤抢险,干部带头,万人齐赴,使千万亩田地免遭淹没。他认为,防灾救灾是一系列长期的工作,需要树立长期生产自救的思想:“本来农业不可能全不靠天,我们只要减少靠天成分,把黄河、淮河、长江几条大河整修一下,森林培植一下,塘坝整理一下,改变封建统治时代全不抵抗自然,任其破坏的状况。但也需要大的力量、金钱与时间。目下我们还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只能做到尽量使灾荒减少。”<sup>[1]734</sup>

1954年12月4日,谢觉哉在一次讲话中对建

国5年来与灾荒的斗争进行了回顾,列举了几个战胜灾荒的例子<sup>[1]883-885</sup>。水灾方面:1952年浙江省宁波专区发动群众20万人日夜轮流守护海塘和江堤,保护全部海塘、江堤未出险;1954年长江、淮河因洪峰太高,次数也太多,不少堤防溃决或漫过,但仍保全了许多不易保全的地区(1931年武汉水位在26.94公尺时就被淹了,今年达到29.73公尺,没有出险)。旱灾方面:1952年湖北省大旱,全省38县动员336万人,水车128000辆,利用了许多深山幽谷的水源,打井、挖塘、开渠、筑坝近112000处,救出1150多万亩农田,一般可多收3成左右;浙江省1953年的旱灾比1934年重,但1934年因旱减产粮食36亿斤,1953年由于深入开展抗旱运动,全省参加抗旱的干部有8000多人,动员民工达8600万工日,因而仍保持了常年的收成。虫灾方面:1952年,全国参加捕灭稻虫、小麦蚜虫的达2060万人;1953年共使用喷雾器14万架,药粉6000吨,并出动了飞机协助灭虫,使各地虫害很快得以扑灭。正是因为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建国初期才能一次又一次地战胜灾荒。

1954年,长江中下游出现百年一遇的特大洪水,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有关各省迅速成立防汛指挥部,制定了周密的防汛方针和抢险计划,14万领导干部、1000万防汛大军战斗在抗洪第一线,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此次水灾,从中央到各级政府,为赈灾拨放了巨额的现款和物资,以最快的速度分配到各地灾区,并形成了中国灾荒史上第一次灾民的有序转移。<sup>[5]</sup>这和解放前一遇灾害就出现饥馑流离的境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 (三)救灾是一个与生产相结合的过程

谢觉哉认为,必须把救灾与生产相结合、与人民的迫切建设相结合。1950年3月11日,面临严重的春荒,谢觉哉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题为《我们一定要战胜灾荒》的署名文章,提出“我们战胜灾荒的方法,一方面,各个灾区展开生产自救运动,灾区内部和灾区与非灾区间展开群众性的社会互助互济运动;另一方面,人民政府即使在今天财政比较困难的情况下,也还拿出为数颇巨的粮食用在灾民生产,以工代赈和紧急救济上。”<sup>[1]706</sup>谢觉哉作为内务部长,在领导救灾工作的过程中,是非常重视生产救灾的。1951年,他在写给中南军政委员会民

政部部长郑绍文等人的信中指出:“筹救济粮是必要的,但不是唯一的或主要的,主要应是发展农业及副业生产与社会互助。前者力量有限,后者力量无穷”。<sup>[6]</sup>1952年1月17日,谢觉哉在“关于救灾问题给江西省邵式平同志的信”中,根据江西省灾区存在的问题,提出了9条建议<sup>[1]798</sup>,其中就有5条是关于生产建设的问题。

在生产救灾的过程中,谢觉哉强调“要发扬灾区人民患难同舟的友爱精神,在生产上组织起来,合作互助,并尽可能地实行就地互济,亲邻相帮。”<sup>[1]707</sup>“一个膀子力小,两个膀子力大,灾民搞生产要互助,灾民中有劳力和无劳力的要互助,有劳力和有资金的要互助,灾民与非灾民要互助,灾区与非灾区要互助”,“发动节约,省吃俭用,长期打算”,“这不仅是物质上的有力支持,且对广大灾民生生产度荒情绪上也是莫大的鼓舞”。<sup>[1]722</sup>

生产自救和动员社会力量开展互助互济在建国初期的救灾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如1954年,中央拨付各省的救灾款为3.4亿元,而当年灾民从事农副业生产增加的收入就达3亿元。<sup>[7]</sup>

### (四)救济粮款的发放是救灾工作的大关键

谢觉哉十分重视救济款物的发放细节,他认为:“政府对灾民的粮款救济,是支持灾民生产自救的决定力量。通过它,可以安定灾民的情绪,可加强灾民生产的信心,可以密切政府与人民的联系。”<sup>[1]888</sup>因此,他把救灾款物的发放上升到整个救灾工作大局的高度来看待,他认为:(1)不是放了了事,而是应先经过调查,群众会议,谁处应多,谁处可少,每个村子里谁家应多,谁家可少,务使发放恰当,落在应得者的灾民手里。(2)不是发对了就了事。“发放的过程即是组织的过程”:积极的组织,把救灾粮投入生产,1斗变成2斗、3斗;消极的组织,叫“细水长流”,配合一些东西吃,不要几天吃光了,而要计算吃到有新东西可吃的时候。<sup>[1]723</sup>(3)救灾粮款要发到灾民手里才算数。

1952年2月28日,谢觉哉专门就救灾粮款发放问题复信江西省邵式平主席,信中第一段即明确:“救灾粮款,要发到灾民手里,才能算数;要发到灾民手里并要使之从事生产、而不是坐食,才能算数。”接着赞扬了邵式平亲自去灾区主持救灾粮的发放,并通过列举实例说明:“救灾即只在发放一项

上说,是个极细致工作,甚至要发动全体干部来做。官僚主义、不民主、贪污、浪费等现象是来不得的,也不容许他存在。”<sup>[8]</sup>1954年11月29日,谢觉哉为救灾问题写了一封给受灾地区党的负责人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救济款发放得好与否是救灾的大关键”<sup>[1]879</sup>。信中肯定了湖南省发放救济款的做法:该省为发好救济款,召开了三级干部会,有的开了10-12天,进行干部的思想 and 政策教育,然后把区的指标发下去;三级干部会后,区又开了区乡干部会,分配乡的指标,然后召开了乡人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初步方案。群众对此很满意,干部也认为有了办法。由此可见,在救灾工作的一系列大环节中,谢觉哉突出救济款物发放这一小环节,并非抓小放大,而是抓住了关系整个救灾工作全局的关键问题。

#### 四 结 语

谢觉哉经历了旧新社会的转变,他的救灾思想透露着旧新时代的对比,折射着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睿智和体察民情的朴素情怀,同时也对我们当代社会有着不可忽视的借鉴意义。他善于寻找灾害的深层次原因,注重从社会成因入手,启示我们在处理自然灾害问题时,应该从人与自然和谐的层面,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高度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重视人民在救灾中的主体地位,注意发挥群众的主动性与创造性,启示我们在灾害面前,要万众一心、众志成城,这也正是我们近

年来接连战胜非典、禽流感,经受住洪水、地震,继续保持国家稳定发展的力量之源。他注意救济活动的精神力量价值,重视救济活动中款物发放等细节,启示我们在救灾活动中要以灾民为本,从帮助他们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进行救灾,同时要加强监管,做细工作,真正发挥救济工作在安定灾民情绪、树立灾民信心及密切政府与人民之间联系等方面的作用。

#### 参考文献:

- [1] 谢觉哉. 谢觉哉文集[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 [2] 蔡勤禹. 民间组织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赈会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52.
- [3] 邓云特. 中国救荒史[M]. 上海:上海书店,1984.
- [4] 刘仰东,夏明方. 灾荒史话[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 [5] 康沛竹. 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防灾救灾的思想与实践[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33-35.
- [6] 谢觉哉传编写组. 谢觉哉传[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94.
- [7] 孙绍聘. 中国救灾制度研究[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69.
- [8] 谢觉哉. 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谢觉哉部长关于本省救灾备荒工作的指示[J]. 江西政报,1952(3).

责任编辑:卫 华